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工程研究室编

· 理 论
· 方 法
· 实 例

MAKING CHOICE
ON TH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A SOCIETY

社会发展指标抉择

社会发展指标抉择

- 理论
- 方法
- 实例

社会工程研究室 编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编者说明

六十年代以来,对社会发展进行指标化计量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研究机构和有关学者的普遍重视,相继出现了不少有关社会指标的理论 and 描述社会发展计划的计量和计质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赋予社会发展以科学、准确的含义。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把建立社会发展指标的思想、方法引入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计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在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在新的技术革命前夜,面临着发展机会的挑战。这场革命将冲击旧的传统结构束缚,提供一种全新的技术社会模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迎接新的科技革命的战略目标,而目标必须是以指标和指标的满足程度为计量尺度的。多年来,我们对经济领域的指标是不陌生的,但对社会发展指标却缺少宏观的、系统的研究与实践。为决策提供有科学依据、有可行性分析的可供选择的社会发展指标,是社会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当前的迫切任务。

我们在从事社会工程的研究中,涉猎了一些国内外有关社会指标的论著,现在选编了其中一些著述以飨读者。我们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社会指标研究方面的国内外动态、理论方法和指标实例。至于这些论著中的观点、方法是否正确,当由读者自己去评价了。

本书共收入论文和论文摘要56篇,其中有12篇是我所研究人员撰写、翻译的。由于时间仓促,编辑出版时许多论文未能征得原作者意见,谨致歉意。在搜集论文时,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国土规划办公室、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北京市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等单位给予大力协助,特致谢忱。

北京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社会工程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一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总论

社会指标简介.....	(1)
· 关于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	(3)
现代社会指标运动.....	(11)
发展计划向社会指标的转移及指标的应用	(13)
· 建立和比较社会指标的方法论和方法问题	(19)
有关社会指标问题的探讨.....	(50)
社会指标体系：理论与实践.....	(54)
· 社会指标和城市政策分析.....	(59)
关于城市发展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67)
关于北京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	(70)
· 发展指标.....	(73)
社会统计的一些现实问题	(83)
关于建立社会指标的几个问题	(85)
关于社会经济指标的建立及其应用的一些论点	(87)
北京社会工程研究概述.....	(90)

第二部分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评价方法

社会精神生活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	(97)
· 社会指标体系.....	(111)
科学技术综合能力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评价	(122)
科技统计指标体系初议	(126)
· 城市经济社会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	(129)
环境指标体系的建立	(141)
关于建立环境保护计划、统计指标体系的探讨.....	(152)
关于社会环境的质量评价	(157)
城市环境生态综合体指标体系	(162)
石家庄社会环境质量评价	(167)
关于“生活质量”	(176)
论“生活水平”的度量问题	(183)
资产阶级“生活质量”理论述评	(190)
论经济效果的综合指标	(193)
经济生活的质量	(193)
试论评价地区经济效果的指标体系	(196)
论社会生产经济效果的指标体系	(202)
· 城市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10)
应用社会指标度量匈牙利社会的长期发展	(216)

用指数法制订考核经济效益指标的设想	(224)
十六项主要经济效益的计算方法	(227)
根据多目标规划原理确定综合经济效益指标	(230)
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编制问题	(235)
关于建立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进一步探讨	(241)

第三部分 指标体系例

衡量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	(246)
日本测定生活水平的指标体系	(247)
日本的社会生活统计指标体系的领域划分及大类项目	(258)
日本的社会人口统计体系	(260)
联合国社会指标的暂定例示及分类	(306)
比利时的生活质量评价	(333)
生活质量模型	(343)
用于发展计划工作的社会—经济指标	(345)
西德社会政治经济指标体系 (SPES) 1976年简写本	(348)
美国社会指标	(355)
美国科学指标	(36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社会指标体系	(372)
经济效果指标体系	(374)
建立我国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的探讨	(375)
我国社会生产和建设总效果指标设想	(386)
社会统计指标体系	(387)
社会经济指标体系纲要设想、指标及项目	(459)
社会经济指标体系及有关文献资料索引	(464)

第一部分 总论

社会指标简介

张仙桥

近二、三十年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有所增长,却没有给社会带来安定。他们认识到“富裕并不等于幸福”。日本的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生活越富裕,贫富悬殊也越大,环境污染、社会公益、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也越多。因此这些国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来从事社会统计和社会指标的研究。如美国从1973年起每隔三年编印一本“社会指标”;欧洲共同体从1974年开始每年发行《共同体成员国的社会核算》;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的经互会于1976年通过了《社会统计基本指标体系》。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中,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创造更好生活条件的手段。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3年起,已先后在泰国、乌拉圭、加纳等国为建立社会经济指标召开专门会议或举办研究班。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经济分析处于1982年11月1日至17日也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社会经济指标及其应用》研究班。参加研究班的有中央及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国家业务部门及大专院校共96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工作回顾中指出:“社会指标的思维结构都是以观察为基础的,通常都是定量的,对评价当代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的现状和测量其变化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的《社会指标研究》于1975年发表的《国家制定社会指标的方法》一文中提出:“社会指标是反映社会制度重大方面的状态或状况的时间数列统计。‘重大’指社会制度赖以变革其结构(人们的基本关系)及其准则(根据社会价值而被认可的行为格式)的重大社会过程。按照这个概念,观测社会指标包括观察社会过程中影响社会结构和社会准则的变化指数,并估价变化对未来的影响。”通过社会指标的分析,籍以了解、评价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人口福利情况的分布,识别和监测社会问题与不平等程度,并用多种指标来计量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变化趋势。

关于社会指标的内容,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1976年提出应包括以下领域:人口、家庭与住户、学习与教育事业、谋生活动与无职业者、收入与分配、消费与积累、社会安全与福利事业、卫生、保健与营养、住房及其环境、公共秩序与安全、时间的利用、闲暇与文化、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于1979年编印的社会指标,大致分为三类,即表明系统功能的指标、表明福利的指标和表明公众主观感觉的指标。其中系统功能指标反映向某系统投入的资源(如公共教育支出)和该系统产出的成品(如公立医学院培养出的医学博士的数字)。福利指标指与人们的福利直接相关的现象指标,如通货膨胀、失业、住宅、犯罪等,由这些指标反映出的变化趋势,可以推断人们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公众主观感觉指标是反映人们对某些方面的主观认识,因为福利水平既决定于客观状况又决定于这些客观状况满足个人标准与个人愿望的程度。具体地讲,它包括有十一个方面:即人口与家庭、健康与营养、住房与环境、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教育与训练、工作、社会治安与福利、收入与生产率、参与社会活动、文化闲暇和时间的利用。在社会指标中,生活质量指标是一个重要方面。美国海外委员会1977年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标由婴儿死亡率、平均估计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三个部分组成。

成。菲律宾政府认为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求应包括十一个方面：即食物、水、衣服、能源、交通运输、生态平衡、教育、文化与艺术、体育和娱乐、医疗卫生、谋生手段和经济基础、住房。罗马尼亚已经建立了一套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和总指数。它分为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两大类，然后再分吃、住、卫生、穿和用、教育、文化、业余时间和安全等八个组，每个组又分为三个指标，共计二十四个具体指标。计算时，对每个指标打分数，如吃的方面，从食物中摄取热量，每日每人达到3000千卡为百分，只达到1800千卡为零分；住的方面，平均每间房子住一人为一百分，住四人为零分。然后，对每个指标的分数用加权的办法，求出一个总指数，以综合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总指数既可以同本国的历史时期相比，又可以用来同其他国家、特别是经互会国家相比。看来，象罗马尼亚所采用的综合指标体系和计算综合指数的方法，对于我国是有参考价值的。

世界各国对社会指数的定义与内容大同小异，就不再一一阐述。从上述的定义与内容看，所谓社会指标，实质上是主要依据社会学的理论，来说明经济指标所不能说明的问题。那么，我国过去有没有社会指标，我们又怎样才能完善和建立中国式的社会指标体系？

过去我国的五个国民经济计划，对经济指标与经济统计一直是重视的，也有一些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但对社会指标的研究，缺乏比较完整的体系。有关的统计指标，也多分散由各部门去做。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是一个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面计划，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发展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国编制中期计划的一大突破。其中第五编社会发展计划，包括人口、劳动、居民收入与消费、城乡建设与福利事业、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保护和社会秩序，以及第四编中的教育发展计划等，都属于社会指标的内容。另外，建国以来，我国除了由统计部门定期公布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外，还作了大量的典型检查（如关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家计调查）和专题调查（如1953年、1964年和1982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上述情况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社会指标已有了相当的基础，那种认为我国的社会指标是个空白或者说要象美国那样经过二十五年才能建立起全国的社会指标体系，是没有根据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目的正如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提出的：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只要我们在发展生产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同步发展，那种认为强调社会指标的建立，担心会走上福利主义邪路上去的想法是没有必要的。

虽然我国的社会指标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长期存在着“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率、重投入轻产出、重客观轻主观”的现象，致使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所以很有必要借助社会指标这个工具，来描述和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对发展前景作出科学预测，发现问题也能及时纠正。

为了完善和建立我国的社会指标体系，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并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①完善和建立反映经济发展规模的综合指标、②完善和建立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③研究和建立精神文明指标。然后在这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还应设计若干具体指标，以形成比较全面、完整的中国式的社会指标体系。

摘自《城市问题》第4辑

关于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

秦麟征

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和规划、计划、管理、未来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研究(Social study)领域中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却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指标运动(Social indicator movement)。^①这场运动涉及到社会发展战略,国情评估,社会的计划、规划、管理、社会政策,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强调:搞好社会指标的收集、分析和研究工作,建立国家社会指标信息系统,重视社会指标在决策实践中的作用,对研究或解决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顾美国社会指标运动的始末及其影响,考察由于这场运动的促进而出现的社会指标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一、这场运动尽管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社会指标概念作了多年的开发,但迄今仍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概念;二、在它的促进下,社会指标的开发和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但步伐不大;三、它在建立各种社会指标模型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定成绩;四、对政府决策部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扩大社会指标的决策实践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

社会指标运动的发展

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虽然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不存在社会指标和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美国,社会指标和对社会指标的研究,不但存在,而且已有悠久的历史,只不过在社会指标运动之前,经济方面的社会指标及其研究占了统治地位,非经济方面的社会指标及其研究只居从属地位而已。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首先就是在传统的社会指标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美国传统的社会指标研究有西方和美国本土的双重历史根源。正如格罗斯^②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收集社会信息的长期传统,对美国重视社会统计工作的风尚具有重要影响。历史记载表明,古埃及的土地丈量及为了战争的需要而进行的人口统计,为西方的社会统计提供了先例。在中世纪时期,西方开始了对政治和行政管理的研究。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笛卡尔、莱布尼茨和许多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都在不间断地收集着有关“国情”的信息资料。而由德国人首创并于1770年译为英语的“统计学”一词,其最初的含义就是“国情政治学”。安德鲁斯和威瑟^③也认为,西方对社会指标的兴趣,是屡见不鲜的。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那种认为社会课题适于定量分析的见解,早已为世人所注目。许多天文学家、化学家、博物学家、数学家都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十九世纪的英国,也曾就贫困问题进行过先

^①社会研究,在美国也称social research,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用两门以上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方法来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研究课题。

^②西拉库斯大学管理教授,曾任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执行秘书。

^③两人均为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所社会研究专家。

驱性的研究。

格罗斯在论述美国的社会统计传统时写道,以启蒙时代的热心倡导者为首的开国之父们所起草的宪章,是美国从建国一开始就重视社会统计的明证和象征。宪章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社会统计,使居民、人口构成、民权、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社会统计制度化。根据这种制度,社会统计工作不但必须进行以保证收集和提供所需要的社会信息,而且总统必须根据社会统计,不断向国会提供有关国情的信息。

在美国,除了总统的“国情咨文”以外,根据1921年预算和统计法案提出的“预算咨文”,根据1946年就业法案提出的“经济报告”,根据1962年人力开发和训练法案提出的“人力报告”,以及政府各部的年度报告、美国统计摘要等等,也陆续加入了美国社会统计的行列。尽管美国社会统计的传统具有偏重经济指标的特点,但这种传统连同1936年形成的一整套经济指标,显然为社会指标的进一步研究和社会指标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社会指标专家所作的一些统计表明,在社会指标运动开展之前,美国的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仿效经济指标和经济系统模型,做了许多先驱性的工作,在全面获得国家复杂的社会信息方面进行了开发。如D.拉诺的“五十四个社会的社会变化模型”(包括传统的、转变的和现代的社会),G.阿尔蒙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投入产出模型,”D.伊斯顿的“各种政治适用的投入产出模型”,F.里格斯的“小变异和多变异社会的历史变化模型”,K.德茨希的“社会通讯联络渠道的控制论模型”等等。此外,许多学者也早就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建立家庭、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系统模型的必要性,或强调研究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技术、经济体制和社会学家们通常所关注的那些事物的作用。

然而,直接导致社会指标运动的主要原因,并不在历史根源方面,而在于:1.美国高度的技术发展水平,激发了对社会指标的强烈社会需要;2.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社会指标反映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

社会指标专家们指出,社会指标运动的发展,与“强烈的社会需要感和人们对目的、合理性在指导人类事务方面所起的作用所持的那种固有的乐观主义”有关^①。强烈的社会需要来自技术的高速发展,因为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社会发生深刻的、日益加剧的变化。技术的发明意味着社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接受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因此,权衡技术发展的代价、效益和利弊,就成了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显然,美国开发空间技术对社会指标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项极其庞大的技术计划,向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在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其他方面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从事这一计划是否值得?它的发展对人的宇宙观究竟有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实际和潜在的影响?从总的情况来看,它对社会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等等。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人们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些鉴定或衡量影响和利弊的手段,即所谓“技术评估”的准则。在社会指标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此类准则的核心就是:技术的发展必须合理,同时必须符合人类的目的。他们认为,人们在评估某种技术的影响时,往往倾向于在有限的范围内评估它在解决技术问题上的能力,而忽视它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既然技术发明的影响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并与社会的其他领域有关,那么就必须补充和完善权衡技术发明的代价和利弊的依据即社会指标,以扬长避

^①《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第二页。

短，防止技术发明可能给社会造成不平衡、不利或令人不满的后果，或预报由于技术发明而出现的各种新的社会需要。

经济领域只是社会的一个领域。经济指标所反映和衡量的是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不是社会各个主要方面的发展状况。因此，尽管经济指标的作用不能低估，但它所反映和权衡的只是社会的部分而不是整体。它只收集经济领域的信息，而且仅仅是数量方面的信息。对一个社会来说，它除了需要经济方面的信息之外，还需要“政治、社会、文化和生物物理”等方面的信息，而且“质量方面的信息，完全可以和数量方面的信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①。经济指标既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各种信息的要求，也不能提供重要的有关社会质量的信息。而且过份强调经济数据，往往“导致对国情的狭窄或不平衡的看法”^②。经济指标在反映和衡量整个社会基本状况和社会质量方面的这种双重局限性，导致人们去寻求一种更全面、更综合的社会指标系统。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原因之外，美国社会指标运动的出现与发展，还与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在五十年代肯尼迪执政时期，已出现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年度《趋势》报告和每月的卫生、教育和福利《指标》。在六十年代约翰逊执政期间，出现了新的“规划—计划—预算系统”，它“要求政府各部把经过仔细选择的、有关投入代价的信息和由政府或私人计划提供的服务性的产出（包括财政援助、咨询和管理等）联系在一起，并根据所提供的最后效益对各种受益者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评价。”^③约翰逊政府的这种行动，是和约翰逊提出建立“伟大社会”的政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政治当局的需要和重视，为社会指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促进社会指标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有关文献表明，社会指标运动作为美国整个社会指标研究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本身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 理论研究阶段：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为加强社会指标的研究广造舆论：呼吁建立科学的社会指标体系，要求在政府设立类似经济顾问理事会的社会顾问理事会，倡议筹建或扩大社会指标的研究设施；同时加强了对社会指标的概念和性质、理想的社会指标体系和研究设施、反馈系统的重要性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2. 应用研究阶段：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在这段期间，社会指标的研究着重在社会变化指标、社会指标的应用及其评价、社会指标与社会政策的关系等方面。应用研究和方法论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

3. 生活质量指标研究阶段：始于七十年代早期，至今仍在继续^④。在这段期间，出版了许多以富裕、幸福、生活水平、家庭状况等方面的生活质量指标为中心的论著，同时出现了这样一种主张：要切实可行地进行社会指标研究，就必须研究生活质量指标，并以个人的幸福作为研究的中心或出发点。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指标运动开始进入低潮，而今，这场运动虽已逐渐销声匿迹，

①②《Social Indicators》，第154页。

③同上，第Xiv页。

④实际上，对生活质量的研 究早在社会指标运动前就已开始。当时的研究着重心理上的统计和分析。社会指标运动以后的研究，发展了原来的研究特点，把心理指标作为社会指标的组成部分，并挑起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的争论。

但《社会指标研究杂志》的出现和生活质量指标研究的深入,都表明美国社会指标的研究仍在继续。这场运动促进了社会指标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在进一步开发社会指标的概念和建立社会指标模型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社会指标概念的开发

社会指标究竟是什么?它和经济指标有何不同?包括不包括经济指标?它是社会的数量指标还是质量指标?在社会指标运动中,围绕上述问题所展开的辩论,涉及到社会指标概念的性质和特点。美国积极主张开展社会指标运动的许多专家、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迄今为止,在开发社会指标概念方面的差异,仍然留下一些痕迹。

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社会研究专家F.M.安德鲁斯和S.B.威瑟指出,“在社会指标究竟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争论。”^①

1966年,R.A.鲍尔、^②B.M.格罗斯、A.D.拜德曼等人,^③为美国文理科学院撰写了《社会指标》一书。他们认为,“统计”(statistics)一词,从词源上说,派生自拉丁语natio status,译为国情(state of the nation)是非常恰当的;而社会指标,就是社会统计或“国情”,是“判断社会在准则、价值和目标等方面的表现”的依据^④。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们把社会指标解释成一种“量的数据,用来作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指数”,是经济指标的“补充”和“扩大”,是衡量社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的尺度”,可以“在那些通常不易于定量衡量或不属于经济学家专业范围的领域内,为我们提供有关社会状况的信息”^⑤。

他们的论述表明,社会指标不但是社会的数量指标,尤其是社会的质量指标。它和经济指标既有统计数据方面的共同特点,又有范围大小和对社会质量的描述功能方面的区别。即是说,社会指标指的是整个社会其中包括经济领域的指标,而经济指标只涉及经济领域,并且“涉及的不是‘有多好’而是‘有多少’,不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而是美元和商品的数量”^⑥。

美国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两位社会学家E.B.谢尔登和W.E.穆尔为社会指标作了另一种解释。他们写道,社会指标可提供如下两方面的指示数据,即“社会整体某些部分的当前状况和根据某些规范准则衡量的不论是前进或后退的过去与未来趋势”^⑦。他们实际上把社会指标看成是一种“允许作出长期比较的时间序列、使人们可以抓住长期趋势和不寻常的大幅度的波动率”^⑧。这种观点,强调了社会指标的时间序列性、过程性等特点和监控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

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专家们则把社会指标定义为“对受规范约束的直接利害关系所作的一种统计,它便于人们对社会主要方面的状况作出简明的、综合的和平衡的判断”^⑨。

①《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第3页。

②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已去世。

③华盛顿社会科学研究局高级研究人员。

④《Social Indicators》,第69页。

⑤同上,第Vii, Viii, Xiii页。

⑥同上,第Xiii页。

⑦《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第4页。

⑧⑨《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第3页。

显然,这种看法突出了社会指标的重要性,把社会指标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余和其后各家的说法,大致上没有离开上述几种基本观点的范围。只有美国1977年出版的《未来:情报资料指南》一书^①,把社会指标定义为“除了经济指标之外的其他指标”,把社会指标与经济指标绝然分开。这种状况,表明对社会指标的不同理解,仍然留下了一些痕迹和影响。

虽然为数不多的社会指标专著还没有提到众所公认的最佳解释,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美国诸家在开发概念方面所作的论述,综合出社会指标的基本特点:

1.从性质上说,社会指标是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对社会各种基本状况的性质和数量所作的综合反映。它象时间、季节和天气等自然指标一样,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自然指标使人类了解自然状况的变动,而社会指标则有助于人类了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质量的变化,是对一个国家进行国情评估的重要依据和尺度;

2.从形式上说,社会指标是以数量的形式表现的社会统计数据;

3.从结构上说,社会指标由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构成;

4.从时间上说,有关社会过去和现状的指标组成了连续的时间序列,根据这种序列,可以外推出预测社会未来发展状况的指标;

5.从功能上说,社会指标可以通过反映社会规划、计划、管理和决策所需了解的各种情况的变化,为国家制定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政策、改进社会管理服务。

社会指标模型

在社会指标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模型,如国家社会指标系统模型、社会变化指标模型、生活质量指标模型等等。

国家社会指标系统模型,是1966年由格罗斯设计的。设计这种模型的目的,在于试图解决下列三个问题:1.如何最好地评估国情?2.如何概要地描述有关国家未来的任何大计划中的基本成份?3.如何断定各种(主要的和次要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可以预期和难以预期的)新计划或其它国家目标的效果?格罗斯根据系统论原理和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分析设计出来的这种国家社会指标系统模型,实际上是一种从微观到宏观、从简单到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大模型。它脱胎于国家经济统计模型,并加以补充和扩大。照他看来,只要有了这样一种模型,人们就可以分析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刻(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情。

格罗斯模型,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由系统结构和系统行为这两种基本成份组成的大系统。同时,它还注意到上述两种基本成份与外部环境的联系。

所谓社会的系统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内部关系。格罗斯模型的社会系统结构包含下列七个组成部分:人;非人力资源;次系统;内部关系;外部关系;价值和领导群。根据这七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都可以收集到不同的有关系统结构的数量或质量指标。

所谓社会的系统行为,指的是社会系统获得投入并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行动。格罗斯模型中有关国家社会系统(或组织社会系统)行为的设计,包括:满足利益;制造产出;对系

^①世界未来学会编,华盛顿出版。

统进行投资；有效使用投入；获得资源；奉行准则和采取合理行动等七个部分。

格罗斯模型，是一种大而全的模型，它要求收集上述十四个部分中每一个部分的许许多多指标，没有各个部门统计工作的协调和合作，是很难完成的。这种模型仅仅为国家社会指标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粗线条的框图。

六十年代末期出现的有关社会变化指标的许多模型，是美国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提出来的。这些试验性模型，分别应用人口、生产、劳动力、就业、科学技术、政治、家庭、宗教、消费、闲暇、健康、教育、社会分层和流动、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指标，探讨美国社会的变化。上述学科的专家们，根据他们各自所设计的概念模型，收集历史和现状的社会指标，进行量的分析，以考察产生了广泛结构变化的美国社会。这些模型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点是：1. 用对人口发展趋势、人口构成和人口分布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了解人口变化，并把这种变化作为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2. 通过对社会生产商品、组织科学技术活动、进行各个领域的再生产、维持社会秩序的不同功能指标所作的考察，了解社会结构主要成份的变化；3. 通过对社会各种产品（人、商品、服务、知识、价值和秩序等）在人口各构成部分中的分布指标所作的观察，了解社会在分配结构上的特点；4. 通过分析整个社会系统在社会不平等、机会不均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变化的方法，了解社会统计结构的特点。

社会变化的各种模型，尽管仍然是试验性的，但已比格罗斯的纯概念模型前进了一大步。它们是格罗斯模型的社会系统结构部分的具体化和实际应用。

生活质量指标模型，和社会变化模型一样，也是一种应用模型。它被用来描述生活水平的发展变化，评价生活的质量或生活是否幸福。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感觉指标模型，是生活质量指标模型的一种。例如，坎普贝尔、康弗斯、罗杰斯等人的Cs—Cd等级模型(1976)^①，安德鲁斯、威塞的D—T等级模型(1976)都属于感觉指标方面的模型^②。此类模型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们在生活方面所关心的事情（如婚姻、健康、朋友、工作、宗教信仰、政府的作为、邻里关系等）和这种关心得以满足的程度。它们的概念模型，由两个基本成份构成，即个人所关心的生活领域和个人对这些生活领域进行评估的准则。从这种概念模型出发，研究者可以通过发问题调查表或其他方法（如交谈等）^③，收集到被调查者对生活质量所作的不同评价，并汇总为图表或各种统计指标^④，然后作出对各级（国家或地方）生活质量的总的综合性评价。非感觉指标，指的是除感觉之外的外部或客观的指标。专家们认为，感觉指标模型如能与非感觉指标模型相结合，那么这种综合模型将更有应用价值。

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生活质量指标模型，表明社会指标研究在模型的改进、方法的应用和指标的收集整理等方面的发展；并表明专家已经注意到有选择地收集重要的、综合性的指标的原则。

①即Completely satisfied—Completely dissatisfied Scale。它把人对生活质量的感觉分成从完全满意到完全不满意等许多等级。

②即Delighted—Terrible Scale。它把人对生活质量的感觉分成快乐——可怕的七个等级，其排列顺序为：快乐、高兴、大部分满意、满意与不满意大致相等、大部分不满意、不快乐、可怕。

③在调查表或交谈中，提出诸如“你觉得你的家庭生活如何？你觉得你的工作怎样？你的居住条件如何？”之类的问题。

④例如，有一种图表，根据应答者的回答，区别出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或关心群。

对决策部门的影响

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在促进社会指标的系统研究的同时，对政府有关决策部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66年，美国的国家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它的一份报告中，发出了加强社会指标研究的呼吁，督促政府采取行动以缩短社会指标应用于决策方面的差距，并为其后的社会指标系统构思了框架。其他的联邦机构也逐步开始了扩大社会指标应用领域的实践。1970年，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开始考虑与“对总统的经济报告”并行的“社会报告”的内容。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统计室也于1973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个综合性的年度社会指标报告。此后，美国社会指标运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虽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但却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使有关社会指标的思想在联合国，在法国、印度、加拿大、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得到迅速传播，促进了联合国和上述国家社会指标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美国在建立社会指标信息系统的实践方面，固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差强人意。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国家指标(NIS)的建立及其迅速夭折。

J.T.斯布雷何最近撰文对国家指标系统的兴衰所作的回顾和评述表明，社会指标运动倡导者们所主张的那种社会指标信息系统曾在国家高级决策机构中出现过。

1981年上半年紧接着里根上台之后出现的国家指标系统，是一种松散的通讯联络机构。它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资料，描述国家状况，定期、迅速地向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提供制定政策前所急需的、与政策紧密联系的社会、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它只提供客观、实际的观点和报告，而不作出某种政策抉择。因此，它充当的是联系政策计划过程的“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但这个系统好景不长。它虽然在1981年春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到秋季便开始衰败，到1982年春陷入绝境。如今，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在国家指标系统存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它未能完成每月两份要点报告的任务。它根据白宫计划评估办公室的旨意选定的10个报告课题，只完成了7个。其中到达总统和白宫高级官员手中的5个报告，其题目和主要筹备单位分别为：1.从1980年统计中得到的早期发现（统计局）；2.对农业和美国农村的看法（农业部经济统计处）；3.中心城市的状况（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经济事务办公室）；4.管理的成长（人事管理办公室）；5.美国的暴力行为（司法统计局）。其余两个报告是：6.保健经济学（国家健康统计中心）；7.国内关键矿物的供应（矿业局）。

斯布雷何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认为，国家指标系统的实践，证明这种系统有能力动员人才和联邦统计系统的数据资料，并能按要求迅速提供高质量的、为管理政策所需的各种要点材料。到达白宫的材料，得到了积极的肯定和好评，并对许多政策的制定和管理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它之所以夭折，一是还不够快，无法及时反映白宫所需了解的迅速变化；二是听众（总统和白宫高级官员）太忙，听取报告往往排不上工作日程，在决策方面失去意义；三是没有正式的编制和专款经费，抽调的人手包括负责人都是临时的，一旦他们忙于其他事务或被抽回，国家指标系统也就名存实亡了。它在身后为白宫留下了一种信念：使总统和白宫高级官员在参加有关政策抉择的辩论之前，获得有关某一问题的客观要点材料，是很重要的。这种信念已变成白宫计划评估办公室的实践。美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的有关国家社会和人口形

象的报告中，之所以强调有关贫困问题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按照这种信念行事的 结果。

可以说，国家指标系统的建立是社会指标运动的影响的产物。它的夭折，意味着社会指标研究的发展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而建立为决策服务的国家社会指标信息系统的前景也不令人乐观。对这场运动和这种研究的评价，誉者虽然不少，怀疑者也不乏其人。哈佛大学的W·阿隆索教授认为，社会指标运动似乎热闹过一阵子，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多深的印象；由于社会问题比较复杂，不易于统计，因此社会指标的收集是比较困难的；而且社会指标对决策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也很难说。

美国社会指标运动已经结束。社会指标的研究仍不同程度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继续。对这种研究的发展趋势，格罗斯曾在六十年代中期作过预言。他写道，收集社会指标方面的进展将是缓慢和不平坦的，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社会统计概念才会成熟，要搞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有各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的积极参与和持续努力。近二十年来美国社会指标运动和社会指标研究的发展状况，似乎已经证实了格罗斯的预见。

转自《国外社会科学》1983. 第2期。

现代社会指标运动

黄 琪

近二、三十年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手段。为此,必须对影响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的社会问题予以密切注意。这些国家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从事社会统计和社会指标的研究,以了解评价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人口福利情况的分布,识别和监测社会问题和不平等程度。通过用多种指标对人口的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计量,计划者和决策者就可发现问题,因此调整改变政策或采取其它改进措施。过去收集和发表的社会统计资料是各部门分别进行的,已难于满足计划者和制定政策的需要。目前发展起来的作为计量人口福利各方面状况和趋势的社会指标是以广泛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并将其组织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中。

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六十年代末期,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以及所属成员国积极地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社会统计和社会指标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发展中十分活跃的领域,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的经互会(Council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1976年通过了《社会统计基本指标体系》,以此作为该成员国开展社会指标和有关的统计工作的基础;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已经着手进行了一项旨在选择和确定一些着重于生活状况的社会指标以及改进必要的社会统计工作的计划。在《共同体国家社会情况的发展报告》中,发表每年的社会统计资料。1974年起开始每年发行共同体成员国的《社会核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制定一系列可用来监测社会问题的社会指标,1976年发表了《社会福利的计量:社会指标发展的进展报告》。联合国各个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社会防务研究所(UNSDRI)等,着重于从事他们所负责的和感兴趣方面的社会指标的改进和推广工作。

联合国统计局一直在进行将社会,人口与有关的经济统计统一的工作,并将其用到社会问题的统计和社会指标的制定中去。

1975年发表了以经济计量学家英国剑桥大学R.斯通为首的专家组起草的《建立社会与人口统计体系》的工作报告。由于这个体系在用指标监测社会各方面发展状况和过程中有很多特别的优点,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赞扬。此后在使用该体系的过程中又不断改进完善,发表一系列的工作报告。例如1979年发表的《社会统计综合研究的技术报告》对该体系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总结和说明,提出了对社会与人口综合体系的进一步工作的设想。在广泛应用的基础上1977年联合国统计局发表了第一本与社会人口统计体系的发展相协调一致的《社会统计提要》。该出版物包括151张表格,列出的主要统计项目描述了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社会状况和社会变化情况。

与此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统计局发表了关于包括各种反映各国人口生活状况和福利水平的社会统计提要。其中最早由英国统计局出版的《社会趋势》在世界很多国家发行,该

出版物反映出社会科学家对社会指标，建立模型和社会人口统计综合研究所做的巨大努力。六十年代中叶，美国政府要对社会状态进行全面估计，在当时的美国总统提议下成立了一个社会指标小组，由80多名社会科学家和政府统计人员从1966年开始收集统计资料，1968年发表了名为《社会发展纲要》的小册子。该报告分为七个章节，对现代复杂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小型样本。后来又用了四年的时间编写绘制了《1973年社会指标》，1977年出版了《1976年社会指标》，1980年出版了《社会指标Ⅲ》，包含的统计内容越来越广泛，深入。

为了协调社会统计和社会指标的工作，七十年代以来召开了很多国际组织的统计学家会议，例如，1975年11月联合国统计局召集，联合国很多机构和其它一些国际组织的专家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社会统计工作以及建立社会与人口综合体系的问题。讨论制定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统计项目、分类和社会指标。

社会的发展和世界人口的增长要求人们更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各国政府要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出决策，对社会发展作出计划，决策者和计划者需要有更多数量，更好质量的社会信息以全面、准确地了解社会现状和变化趋势，社会统计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推动了“社会指标运动”的发展。各国际组织及其所属国家正在不断地统一协调和改进各自的统计项目、统计口径和分类，从而也促进了各国统计方法、技术的改进。目前的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今后各国和国际机构还将在编辑和使用社会指标中，不断积累经验，使之进一步完善。无疑这将对社会的进步、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摘自“社会经济指标及其应用问题研究班”会议资料，
《现代社会指标运动以及社会与人口统计体系》1983.11